宋代科举社会的乡村形态
——吉水亿田刘氏家族举业的个案研究

马 利 清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吉水亿田是宋代文化发达的江西中部的一个山村,其时人口当不满百人,却随着北宋皇祐元年刘良肱进士及第而开启了一个家族三代内多人举业成功的历史。将亿田刘氏家族举业成功的事实嵌入中国历史在唐宋之际的深层转型,可以发掘出其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意义,了解宋代科举社会形成的乡村土壤,从区域和基层视角解读北宋科举社会的乡村形态。

关键词: 科举社会;乡村形态;宋代;庐陵文化
中图分类号:K 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9)06-0122-10

论者多以宋代为中国古代科举社会的形成时期,并围绕这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其中科举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互动是一个颇受关注的方面。从阶层流动性强的时段来讲,为什么从北宋开始乡村平民大量应举并因此跻入仕途,而且两宋时期平民子弟科举及第的比例在帝制中国历史上最高。从地域变化来讲,为什么两宋时期乡村平民科举成功者多来自江西、浙江和福建等江南和东南地区。此为科举社会研究中的核心议题。尤其突出的现象是,经济和文化基础原本都较为落后的今属江西的饶州(宋代属江南东道)、吉州(庐陵)和抚州(临川)地区,从北宋初年开始迅速成为文化最为发达的先进地区①。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除了四川的“三苏”之外,另外三家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都出自这两个毗邻的地区。奠基于宋代的庐陵文化和临川文化,其影响及于数百年之久。宋代吉州和抚州众多文化精英的出现,基础是大量乡村士子的科举成功。从方志和族谱资料可知,在北宋中国科举社会形成的早期,以这两个州为核心的整个江西地区,出现了数量相当庞大的举人阶层,也诞生了远超过其时除了福建和两浙以外其他地区的及第进士。这个历史现象的形成,除了十国中的吴和南唐政权相较于其他政权更加崇文重教,以及北宋科举及第名额扩大等大时代背景之外,其背后还有着更深层的具体社会原因。吉水亿田刘氏家族是一个堙没千载、从未受到学界关注的宋代庐陵文化核心区的一个乡村家族。本文通过田野调查,运用新见宋人墓志、流传有序的刘氏族谱和各种方志文献等相关史料,分析这个家族在两宋时期的举业成功历程,进而探讨宋代科举社会形成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影响,以期有助于揭示江西地区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的特殊位置和时代角色。

一、亿田刘氏家族的科举成就

亿田村位于江西省吉水县螺田镇西南约 7 公里,与河镜村和城陂村是三个毗连的刘姓自然村。村民们同宗同祖,有较为完整的族谱《亿田刘氏合修族谱》,初修于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据族谱记载,唐朝德宗时期一世祖刘宗臣因官迁入虔州(治今江西赣州)宁都,第七世琎公因任职吉州地方官而留居庐陵,第九世刘义甫“由庐陵徙

收稿日期:2019-07-10
作者简介:马利清,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① 据贾志扬统计,北宋及第进士各州的人数分布不均,人数最多的几个州分别是福建路的建州(建宁府)、福州、兴化军、泉州、南剑州,两浙西路的常州、湖州、苏州,两浙东路的衢州,江南东路的饶州,江南西路的吉州等地,上述军州在北宋的及第进士都在 200 人以上。见贾志扬《宋代科举》附录三,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5 年版,第 289—298 页。

居吉阳明善里蛇田”,义甫生彦琛、彦桀及彦荣,彦琛分徙砂石源株林下,彦桀后裔为亿田开基祖,彦荣后裔迁河镜村(后迁出)。彦桀生鄷公及郧公,鄷公迁居潢陂头。郧公“因唐末充户税典吏,部曲弓手抵应,与赤城贼义战被杀,身没于盘岭,招魂归葬于公陂仙鹤窠”。吉水当地乡间地名古今基本没有变化,蛇田、亿田、城陂、河镜、株林下、潢陂头、公陂等村名都是自宋代沿用至今,这些村庄相距不过十余里。在唐末五代动荡环境下,有大量因官留居吉州的各地人士,在当地乡村发展成为中小地主。欧阳修先祖和解缙先祖亦如此①。第十二世“珪公”为郧公之子,“唐天祐元年(904)遭贼逐,避地,尚赖永丰玉田张氏姑夫抚养成人,吴王杨溥顺义七年(927),老佃跟寻,伯兄命同归家复业,交付契券,检粮税贴收执,回住亿田。四妻生九子,皆仕,子孙财旺官盛,名望显扬,明善里东西两畔上下十里皆称刘焉”。珪公经过二十多年投亲避难,于吴顺义七年到亿田开基。从此宗族繁衍至今逾千年,已至49世。现居城陂、河镜等村的刘氏家族,均为亿田刘氏分出的支裔。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中,这些村庄至今保留着浓厚的宗族观念和淳朴的民风,以及传统的耕读传家的乡村文化形态,堪称中国传统宗族社会的活化石。明清时期的宗祠、匾额、墓葬、墓碑至今大量存在,与族谱、地方志可互证互补。尚未开掘的亿田刘氏家族史料的独特价值,在于它由墓志、族谱、匾额以及鲜活的日常生活、节庆礼仪和家族记忆共同构成了一幅绵延千载的乡村历史画卷,为从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多学科角度进行综合研究提供了稀有的材料②。

刘氏族谱由第十八世、南宋恩科进士刘铎主持初修,其后于元代元贞乙未(1295)、明成化八年(1472)、清雍正六年(1728)、道光五年(1825)、同治十二年(1873)、民国二十五年(1936)和1993年分别进行了二至八修,世系完整,传承有序,序谱中还保留了内容丰富的早期文献。族谱的历次编修遵循不改旧谱的规矩。每一修都有名人作序,初修序作者董德元、三修序作者罗伦和六修序作者刘绎,都是科举考试的状元。族谱中追述的早期先世或属攀附与传说,然自九世祖义甫“由庐陵徙居吉阳明善里蛇田”之后,尤其是移居亿田村之后的家世,则基本可靠。族谱所记第十五世有刘日超,其四子刘淳、刘泾、刘洵、刘良肱,即十六世。刘良肱于北宋皇祐元年(1049)中冯京榜进士,事迹见于明清两代《江西通志》及清代《吉安府志》,官至蕲州推官③,似乎终其一生都未离基层佐吏,死后葬于家乡。

据族谱可知,自刘良肱始,亿田刘氏家族连续三代集中涌现了一个进士及第高潮。刘良肱兄刘洵晚年与其子刘景显(万历《吉安府志》作刘显并有传④)同时中元丰二年(1079)时彦榜进士⑤。刘洵事迹未见于正史,仅见于族谱。元丰二年刘洵57岁,很可能是屡试不第,受推恩所得,或受益于其弟刘良肱及其子景显的相继及第。第十七世有进士二人,除景显外,刘洵七子景融屡试屡败,于宣和三年(1121)53岁时推恩第五甲同状元何㮚榜进士。第十八世有进士四人,刘泾之孙刘铎在乡试中屡次发解,晚年于绍兴乙丑(1145)登林洵美刘章榜第四甲进士推恩,刘洵之孙有三人中进士:景显之子刘琮中大观乙丑(1109)贾安宅榜进士⑥、刘焕之子希掞特奏名登绍兴壬戌(1142)胡鼎才榜第四甲第十名进士、希掞之弟希韩登绍

---

① 参见刘文源《欧阳修先世考》,刘德清、欧阳明亮编:《欧阳修研究》,北京: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35—542页。又参见《鉴湖解氏十二修族谱》,现藏吉水冠山乡福全村庙上村小组解延道家。感谢吉水县文联主席杨巴金先生提供。

② 参见马利清《踏寻庐陵文化的乡村土壤》,《井冈山报》2019年5月8日。

③ 林庭　修、周广纂:《江西通志》卷二六,嘉靖刻本,第4064页。刘良肱事迹又见于雍正《江西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版;定祥、特克绅布修,刘绎、周立瀛纂,汪泰荣点校:《光绪吉安府志》,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

④ 余之祯总修、王时槐纂修,王泰荣点校:万历《吉安府志》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56页。

⑤ 林庭　修、周广纂:《江西通志》,第4081页。

⑥ 林庭　修、周广纂:《江西通志》,第4104页。

兴戊辰(1148)俞舜榜(按此榜状元王佐,族谱有误,或指恩科榜)第四甲进士推恩。三代人中通过常科考试进士及第者代有一人,分别是刘良肱、刘(景)显、刘琮,其余均恩科赐进士出身。如此举业成就,在这个偏远山村历史上,堪称空前。刘氏家族三代坚持不懈地在科举仕途上奋争,其中最为典型的数主持族谱编修的刘铎。刘铎多次参加乡试并发解,但会试屡试屡败,终于绍兴乙丑年免解进士推恩,时年已 70 岁。亿田刘氏家族的举业成就,除了第十六世到十八世的三代人中出了三位常科进士、五位恩科进士,还有迁出的旁支族亲中的多位进士,包括迁居砂石原株林下的第十六世刘湜中熙宁九年(1176)徐铎榜进士①,迁居河镜的第十六世刘庭光元祐至元符间(1086—1099)三次夺得乡试榜魁,同出河镜的第二十一世刘邦凤于南宋嘉定元年(1208)及第②。

族谱对刘铎同辈及以上两代人相关事迹的记载较为详实可靠。如刘显进士及第后,“为光禄寺主簿,时曾布当国,显于曾为外甥婿,恬退自持,未曾闻见。布贬,显得免为夔州提刑”。显子刘琮,官至王公翊善,五品,为皇子在立为太子之前设立的学官之一(按南宋高宗时为皇储孝宗设立教授、赞读、直讲、翊善等官),“靖康中,为金人所围,金议立张邦昌,范琼以兵胁,在城百官劝进,琮自服痢药,疾势顿委,乃不果逼,邦昌大为之愧。有文学,平生著述最多,尝著《亨屯集》三十卷、《史隐笔语》十卷、《文章集》十卷、《金销碎银》、《错落》各十卷”。刘琮在靖康之变中宁死不屈、不事伪楚政权的节义之举被族谱详细记录下来。他们是继刘良肱科举入仕后,通过科举跻身于政治精英阶层的官阶最高的两代人。

刘良肱兄弟及其众多子侄,都是出身乡村的平民,即使是科举及第后任官在外的刘良肱,去世后也葬回了亿田“本里典坑”。但刘洵的儿孙刘显、刘琮,则无疑是曾在京师开封为官,当亦未能归葬亿田。他们在京为官期间是否与乡村的家族保持密切联系,目前材料难以回答。但互通声问则无疑义,否则族谱中的记载不会如此具体详尽。两宋亿田刘氏家族的崛起,以刘良肱进士及第为起点,延及其兄弟子侄纷纷在科场搏击,整个家族走向辉煌的巅峰。这是刘氏族人修谱、树碑的事实前提。而刘良肱长嫂《宋故彭氏夫人墓志》的发现,又可证实族谱和相关历史记载的可靠性,或补充、修正族谱记载的某些错漏之处。

新发现《宋故彭氏夫人墓志》为村中所见刘氏家族成员中年代最早的一通墓志,是亿田刘氏家族史料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彭氏墓地在距亿田村 8 公里外的恭溪村盘古村小组的曾家坑,刘氏族人至今每年清明节都去祭扫。2019 年清明节笔者应邀参加了亿田刘氏的家族祭扫活动,并通过无人机航拍了墓葬地表。志主彭氏为亿田刘氏第十六世之长刘淳妻,刘良肱长嫂。其生活的时代正是刘氏崛起的关键时期,其墓志涉及家世、婚姻、人物和社会关系,是印证这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墓志记载彭氏卒于北宋熙宁元年,元祐三年(1088)迁葬,志文中所见彭氏卒年以及其子景修、景雄与其孙刘君择等人名、年代均与族谱记载相互吻合,墓志撰写者庐陵乡贡进士欧阳景仁,与欧阳修同宗同祖,在方志和欧阳氏族谱中均有据可查,书并篆额者为著名史学家、《资治通鉴》编撰者之一刘恕,而刘恕与刘良肱为皇祐元年同年及第进士。彭氏为沙溪大姓,与欧阳修同乡,年纪相仿,两姓又为世代姻亲。由彭氏夫人连接起来的亿田刘氏与沙溪彭氏、欧阳氏的姻亲关系,对刘氏的科举道路当有深刻影响③。

除《宋故彭氏夫人墓志》外,刘铎为其父与母亲合葬墓所刊《金鱼塘阡表》及所附《金鱼塘阡表文集序》《金鱼塘阡表文集跋》等相关文献亦被收录于族谱中。金鱼塘刘氏家族墓地距亿田村约 5 公里,后人亦祭扫不绝。由于墓表和文集实物已无存,族谱保留的信息就尤为珍贵。“墓表”是树立于墓外、与藏于墓室内的墓志相似的更具炫耀门庭效果的碑石,最为著名的就是欧阳修在永丰

① 林庭 修、周广纂:《江西通志》,第 4080 页。

② 林庭 修、周广纂:《江西通志》,第 4197 页。

③ 参见马利清、刘后魁《吉水亿田发现刘恕书〈宋故彭氏夫人墓志〉初步研究》,《南方文物》2018 年第 2 期,第 281—284、247 页。

沙溪为其父母之墓所立的《泷冈阡表》,《金鱼塘阡表》属于同类墓表。在《金鱼塘阡表文集跋》中,刘铎叙述其母的阡表为状元董德元所书,其父墓碣为官任通判的董元章撰。碑文以及地方官僚士绅题写的大量悼念诗词、挽文,由刘铎同年友人李价卿辑录为《金鱼塘阡表文集》并为之作序。李藩(价卿)称其与刘铎为同年,于绍兴乙丑"同释褐于集英殿,定交于死生贵贱之间",时任赵郡学正。绍兴乙丑榜状元为刘章,族谱记载刘铎仕途曾得到刘章的举荐,可知他们交情深厚。董德元、刘章、李价卿等人都声名显赫,刘铎与这些精英人物有着密切的交往,在官场相互引荐提携,在生活中诗文往来唱和,在其亲人死后则捉刀书写墓志、挽诗,在其编修族谱、文集时为之作序,甚至帮助其编纂成集。可见这些文化精英对亿田刘氏的看重。在刘铎自撰跋文中,称因"为贫所困",父母死后十余年才刊刻墓表。可知其并非富室豪门,即便家族三代间多人科举入仕,留居亿田乡村的刘氏家族仍属平民。不过,家族中几代人科举声名支撑起来的社会地位,使得其即使财力窘迫,也还是要想方设法为父母树立阡表,也说明其有一定田产和劳力,能够代表广大的乡村中小地主和自耕农阶层,即所谓耕读之家。亿田刘氏作为由乡村平民而科举入仕的个案,无论在时代还是地域方面,都具有比较典型的代表意义。

二、支撑亿田刘氏举业的乡村社会基础

刘良肱的科举及第无疑是亿田刘氏家族兴旺的起点。因一人科举成功带动整个家族数代人连续登科,从而成为科举世家的现象,在宋代科举发达的南方地区并不鲜见,江西更不乏其例,见于明清时期编修的《江西通志》和《吉安府志》等地方文献中。如南丰曾氏,天圣二年(1024)曾易占中宋郊榜进士,嘉祐二年(1057)其子曾巩、曾布、曾牟以及他们的从弟曾阜兄弟四人同年进士及第,举业成功绵延数代。又如吉水董氏,大中祥符八年(1015)董淳中进士,后其弟董洙、董汀与董洙之子董师德于景祐元年(1034)同时中进士;董淳子董傪于宝元元年(1038)中进士;另两子董偁、董仮中皇祐元年进士(与刘良肱同年)。临川王氏,自王安石之父王益于大中祥符八年中进士,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中进士,庆历六年从弟王沆、皇祐元年其兄王安仁登科,嘉祐六年(1062)王安礼及第,安石子王雱于治平四年(1067)登许安世榜进士,熙宁元年其弟王安国赐进士及第。这些家族中往往出现父子兄弟甚至族人前后相继进士及第的情况,一门多进士的现象甚为常见。一方面说明教育资源的相对集中,一些地方形成家学与地域专学,几乎垄断科场。另一方面也反映人际网络的重要援引作用。北宋出现的科举及第者阶层下移且集中在某些家族的现象,在举业突出的两浙、福建、四川及江西等地都有表现。

刘良肱崛起于殷实的耕读之家,得益于家庭成员如长嫂彭氏对教育的重视,家庭成员的更多付出使其免于田园劳作,而得以专心读书应考。其家族第二代、第三代进士及第者,随着家庭成员地位的升迁,凭借在京为官的便利,已享有补太学生的机会,刘显及其子刘琮已脱离乡村,跻身于社会精英阶层。与此不同的是,刘良肱是完全仰籍乡村的哺育而走出乡村的,是中国历史上较早一代典型的走出乡村走向士林的平民举子。刘良肱的经历,在时代和地域上都具有代表意义,一方面他是乡村平民大量跻身社会精英阶层的北宋前期时代特征的体现,另一方面他也是原属十国时期吴和南唐政权统辖的江西崛起为文化发达地区的体现。这两个方面涉及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不同区域所处历史地位,隐藏着非常重要的历史讯息。探寻其时吉州地区乡村社会的经济文化条件和所处历史节点,对于分析北宋一朝平民出身知识精英的崛起当具有典范意义,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在唐宋间发生的深层转型也大有助益。具体说来,对于刘良肱科举成功的原因和社会背景,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分析。

其一,亿田刘氏在唐末因官留居吉州乡村,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在刘良肱及其之前的几代,是当地的乡村大户。

江西在晚唐十国时期的动荡政局中相对安定,不少地方官留居吉州,在当地乡村买田置地,以其经济实力和文化修养推动了当地乡村的发展。如前举吉州欧阳氏的一世祖欧阳万于唐乾符年间(874—879)担任吉州安福县令,致仕后留居

安福,至欧阳修之父欧阳观(952—1010)已繁衍至第八代,其时欧阳氏已有众多家族支系分布在庐陵、吉水、永丰、安福等县①,是因官留居吉州发展起来的乡村大户的代表。解氏原居平阳、雁门,唐肃宗至德元年(756)解隐(号退翁)随子解郾(号德远)任职吉州刺史而俱至吉州,乾元二年(759)卜居庐陵同水乡②。又如被称为“江南都江堰”的泰和槎滩陂的始建者周矩(895—976),南唐进士,官至金陵监察御史,为避乱随子婿吉州刺史杨大中徙居泰和。槎滩陂修成后,能够灌溉当地农田约 9000 亩,周、杨两个家族在泰和发展壮大③。再如永丰“皇寮书院”的创建者刘庆霖,本为四川渝州人,唐末在吉州为佐官,族谱记为“吉州通判,在唐会昌年间(841—846)离职,值乱,不得归,留寓永丰,始建书院讲学”④。

据亿田刘氏族谱记载,第七世刘琎因官留居庐陵,第九世刘义甫“由庐陵徙居吉阳明善里蛇田”,年代当在晚唐。蛇田这个地名至今沿用,在亿田沿泷江支流螺田江上溯 3 公里处,与刘氏家族兴建的龙禅书院隔江相望。这是刘氏家族从城居走向乡村发展的开端,从其随后几代在当地乡村散布的情形看,当时人口尚稀少,故其能够迅速扩张。至十一世郕公,作为乡村富户,担任了作为乡役的户税典吏,死于抵抗贼寇。其子刘珪,唐天祐元年避乱于永丰玉田张氏姑夫家⑤,其间一直有老佃跟寻,说明其为乡村地主。吴顺义七年归家复业,“交付契券,检粮税帖收执,回住亿田”。“粮税帖”,当是宋代户帖一类簿籍文书,是民户纳粮交税的依据,也是土地田产的证明。⑥ 所谓“九子皆仕,子孙财旺官盛”,当是在杨吴和南唐时期担任地方胥吏或乡役,是典型的乡村富户。至第十六世刘良肱能够于北宋皇祐元年进士及第,其家族的经济实力是重要的前提。

其二,吉州地区自晚唐和十国以来有着较为发达的官私学校,亿田刘氏从唐末开始就建立了家族的寺学。

吉州的府学和大多数县学最早都兴办于朝廷颁诏兴学的庆历年间。明修《江西通志》记载,吉安府儒学“在府治西南兴贤门内,宋为州学。庆历四年知州事李宽奉诏始立”⑦,兴建之初就读生徒有三百余人。在朝担任知谏院、知制诰“世家于吉”的一代名臣欧阳修撰写《吉州学记》以纪其事,“刻辞于石而立诸其庑”⑧。《吉州学记》在庐陵地区士人群体中的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对整个吉州甚至江南西路的科举和学风都起到风向标的作用。吉州的县学大体在北宋中期普及。据《江西通志》记载,北宋吉州各县建县学的时间分别是吉水县天圣四年,庐陵县、泰和县、永新县庆历四年,安福县元丰四年,永丰县至和年间⑨,庆历四年是一个高峰。庆历新政虽然旋即受阻,但兴学之策在地方得到了及时有效的落实。据统计,两宋时期吉安府有新建书院 37 所,其中北宋

① 刘文源:《欧阳修先世考》,刘德清、欧阳明亮编《欧阳修研究》,第 535—542 页。

② 据上引光绪《鉴湖解氏十二修族谱》。

③ 周中和:《槎滩碉石式陂山田记》,嵌存于泰和县螺溪镇爵誉村周氏祠堂墙壁,录文见高立人主编《庐陵古碑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22 页;又见萧用桁编著《石上春秋——泰和古碑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9—22 页。

④ 《吉丰二都渝州刘氏族谱》,转引自汪泰荣《吉州书院志》,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7 页。关于刘庆霖及“皇寮书院”事迹,见于《江西通志》卷二四“皇寮书院”条:“在永丰二都渝州,唐刘庆霖为吉州通判,因家(永)丰,建书院,至十二世孙宋进士琰重修。广西钤□周云记”。明嘉靖刻本,第 59 页。按,吉州通判,唐代州郡无通判一职,宋代始置,当是以后世称谓呼之,族谱称“为吉州倅”。

⑤ 按,永丰县置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由吉水分置。此处记永丰,当是南宋时期初修族谱之时按照当时的区划而言。

⑥ 参见刘云、刁培俊《宋代户帖制度的变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第 91—95 页;冯剑辉《宋代户帖的个案研究》,《安徽史学》2018 年第 3 期,第 138—142 页。

⑦ 嘉靖《江西通志》卷二四,明嘉靖刻本,第 3843 页。

⑧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572—573 页。

⑨ 嘉靖《江西通志》卷二四,第 3846—3863 页。

时期 6 所,南宋 21 所,另有 10 所不详①,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这个数字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和发掘,应当还在不断改写。

吉州地区唐代应当建立了州县官学,因为唐朝建立后,“州、县、乡皆置学焉”②。唐代的州县都设置学官教授生徒,在开元天宝时期还不断下诏强调州县学之生徒进入中央官学和应举的优待条件,力图将州县官学纳入科举的轨道。开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下敕,要求“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③,是将官学办到了乡里。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的官学系统崩坏,州县官学形同虚设。严耕望检出大量唐代士子习业僧寺之例,指出“当时寺院多为寒士聚读之所”,“学子多习业山林寺院,学成然后出而应试以取仕宦矣”④。吉州地区唐代以来州县官学的兴废情况史无明文,推测至少在晚唐五代动荡年月里当已荡然无存。北宋庆历年间的兴学,是庆历新政主要内容“精贡举”的组成部分,即在州县普遍建立学校以为科举考试输送生源。不过,庆历兴学的背景值得重新审视,从吉州地区州县官学的兴起要晚于当地普遍设立民间私学的情况看,朝廷兴学也是在江南民间私学普遍发展基础上的一种官方吸纳和推广。

在一些乡居官员和地主的主持下,吉州乡村于晚唐十国时期开始建立私学,且多为寺学并立。据今人所编《吉安书院志》统计,唐五代吉州地区书院有五所,唐会昌年间吉州通判刘庆霖在永丰创办“皇寮书院”,唐乾符末(879)庐陵(为庐陵县,后属吉水)解世隆建“登东书院”,后唐长兴元年(930),泰和县人罗韬创建“匡山书院”,南唐保大年间(950—960),吉水人解皋谟建“兴贤书院”,南唐李煜八年(宋开宝二年 969)庐陵里人刘玉在今青原区富田村建“光禄书院”⑤。

亿田刘氏的私家学校龙禅书院也是创办于晚唐时期。据族谱记载,刘氏第十世祖刘彦槃“施造龙禅院”,地点在明善里蛇田,今螺田镇城陂村蛇田仍存遗址。刘彦槃生活的年代在唐末,建造书院当在唐天祐元年其儿孙遭贼寇之前。而《吉安书院志》所言“宋庆历间里人刘彦槃建龙禅寺,亦名龙禅书院”⑥,误。族谱记宋真宗乾兴年间(1022)刘彦琛的子孙“又施田 200 石入龙禅院供僧”,证明晚唐十国以来至宋初这个寺学并立的书院一直随着家族的起伏而断续存在。

北宋庆历年间,朝廷兴办州县官学,正值刘氏家族包括刘良肱在内的几代人求学时期。原本就有家族私学的亿田刘氏,是否进入新办的州县官学就读,已不得而知。刘良肱是最初兴办龙禅书院的刘彦槃的七世孙,于皇祐元年进士及第,时年 25 岁。继刘良肱进士及第之后,熙宁九年刘彦琛七世孙刘湜进士及第,官至雄州正奉大夫。元祐年间刘彦荣七世孙刘庭光重修书院。据族谱记载,刘庭光“五荐三魁,登宋哲宗元祐八年进士,仕至银青光禄大夫,后裔迁河镜,黄竹坑、中心坑各处皆庭光之裔也”。查《江西通志》,刘庭光确有多次参加解试并名列第一的记录,但并无进士及第的记载。元祐八年仅举行乡试,没有举行会试。刘庭光“五荐三魁”应指其五次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在元祐至元符间三次乡试获得第一。查《江西通志》《吉安府志》,刘庭光分别于元祐五年、绍圣三年、元符二年三次发解,但终其一生没有在省试中及第。重修书院之举显示其很可能成为乡村教师。族谱记载苏轼曾赠刘庭光联云:“五荐三魁天下有,六亲俱庆世间无。”据村中老者回忆,此联一直悬挂在河镜村祠堂“大夫第”前,直到“文革”时被毁。苏轼确曾作诗记其游历吉水城东南龙济寺、吉州万安惶恐滩及永和清都观等处的经历⑦。

其三,南唐和北宋前期的江西尤其是吉州和

① 衷海燕:《宋元时期书院与理学的发展——以江西吉安府为例》,《宁波大学学报》2005 年第 2 期,第 58—60 页。
② 《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163 页。
③ 《唐会要》卷三五《学校》,中华书局 1955 年版,第 635 页。
④ 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 年,第 372、377 页。
⑤ 汪泰荣编:《吉安书院志》,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7—23 页。
⑥ 汪泰荣编:《吉安书院志》,第 12 页。
⑦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 14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501、9586 页。

抚州地区正在形成引领全国的新型士人群体,亿田刘氏以其乡村富户的条件通过科举考试被编织进了一个起步阶段的士人网络之中。

陆扬的研究揭示出,唐代中后期逐渐形成的政治精英"清流群体"具备了新的时代特征,他们通过进士出身担任清显官职尤其是起草制敕文书的词臣,并发展出以宫廷为中心的文化想象和仕宦策略①。吴宗国等人的研究则提示,中晚唐的进士科考试逐渐成为官员世袭高位的工具,导致了一些世代相沿进士家族的诞生②。宋代的士人群体在文化性格上与唐代中后期的清流群体有一定的继承性,但在具体的家族构成和社会阶层方面,则进入一种全新的局面。唐代清流群体的成员极少有存续至宋代者,宋代建国后重新成长起来的士人群体,其引领者大都来自包括江西、四川在内的南方平民阶层。

宋代士人群体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靠科举—官僚制,以及由此构建起来的交游网络。无论出身高低,进入科举轨道就意味着进入到士人群体网络的编制程序之中。在举世重交游的北宋时代,以科举—官僚制为核心的士大夫个人的活动范围与人际网络得以扩大和重构③。

生活在吉州乡村的刘氏家族,从唐末因官留居本地以来,因其建立私家书院教授子弟,开始汇入到一个即将起步的新兴士人群体构建过程之中。相对于北方的战乱和武人跋扈,偏安的杨吴和南唐政权重文教,兴儒学,新兴的雕版印刷技术开始用于印制儒家经典④,"当时唐之文雅于诸国为盛"⑤,乡村富户得以经营子弟举业。而唐末五代文士地位的普遍下降,又使得江西等传统意义上文化核心区以外的南方地区的乡村士人获得了跻身士人群体的较低门槛。这是刘良肱科举及第的时代大背景。之后,闭塞的乡村随着刘良肱的同年交游和仕途迁转与外部世界产生了直接紧密的联系,其家庭由普通的庶民而成为官户,其本人也进入到士人群体之中。

据《江西通志》记载,皇祐元年与刘良肱同登乙丑冯京榜进士者,出自江南西路的即有 24 人之众,吉州籍占据大半,尤其以庐陵、吉水、永丰三县人数最多。同榜登第的不仅有名臣范纯仁,还有刘恕、李常、王安石之兄王安仁、吉水籍大儒董淳之子董偁、董仮兄弟和同族董偕。这些人物后来都成为亿田刘氏家族人际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刘良肱一生官阶不高,其事迹除了偶见于方志、族谱外,其他史料少见记载。在今湖南郴州市内的义帝陵,保存着一通北宋嘉祐四年立《义帝新碑》,从碑文落款可知刘良肱曾任郴州的军事推官,与《蚕妇》诗作者张俞素有交集。而刘恕书并篆额的《宋故彭氏夫人墓志》,则佐证了刘良肱与同年之间的交往。与刘良肱同年及第的冯京、朱述、沈遘等救助同年的寡妻孤子⑥之事则见于正史和墓志,或可对宋人相交契厚的同年关系略窥一斑。同年之间的情感认同、生活救助乃至官场援引,是其时士人的生活实态。刘良肱长嫂彭氏去世,由同年刘恕手书墓志。刘恕之父刘涣

① 参见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② 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王德权:《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风气》,台北:政大出版社 2012 年版。

③ 关于北宋士人的交游与关系网络的构建,可参看以下论著:朱瑞熙、张邦炜等《宋辽金元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平田茂树《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以科举社会的"人际网络"为线索》,《史学月刊》2014 年第 3 期,第 22—27 页;王瑞来《科举家族与地域网络——以曾安强与周必大为中心的个案解析》,《社会科学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1—5 页;祁琛云《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④ 参见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2015 年版,第 41 页。

⑤ 《资治通鉴》卷二九〇,后周太祖广顺二年二月,第 9475 页。

⑥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文物保管所:《密县五虎庙北宋冯京夫妇合葬墓》,《中原文物》1987 年第 4 期,第 77—91 页;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一)》,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4 年版,下册第 351 页;《宋史》卷三一七《冯京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0340 页;刘挚:《忠肃集》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279 页。

(1000—1080)去世后,撰写墓志铭的也是刘恕的同年李常,为其母撰墓铭的是嘉祐二年进士及第的临川人曾巩。而欧阳修与刘涣交谊颇深,二人同为天圣八年(1030)王拱辰榜进士,欧阳修有诗酬赠。彭氏夫人墓志提供了亿田刘氏家族与士人群体的交游线索。亿田刘氏与沙溪彭氏、欧阳氏之间交织着错综复杂的姻亲、同乡、同年、同僚和师生关系,在互为家族成员撰写墓志的背后,呈现出江西籍士人之间的密切交谊。

晚唐十国以来兴起的江西地区士大夫,在其新型精英群体的构建过程中,颇重乡土人际网络的经营。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王瑞来指出“在地域势力中,乡党、特别是有同年之谊者他们之间的人脉经营尤为受到重视”①。亿田刘氏自刘良肱之后,便已进入到这个士人网络的编制进程中。刘良肱之侄刘显进士及第后,官至光禄寺主簿②,与泸江曾氏家族联姻,娶曾布(1136—1107)外甥女。显子刘琮十八岁补太学生,进士及第,官至五品,在靖康之难中,金人欲胁迫其赞同立张邦昌为伪楚政权皇帝,刘琮服利药致病重,躲过逼迫,令张邦昌大愧。与刘琮同辈的刘铎,在两宋之交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晚年于绍兴十五年推恩登第,得到同年状元刘章保举,官至赣州司理参军。所编族谱和《金鱼塘阡表文集》,由永丰流坑(后属乐安)大族绍兴十八年(1148)“恩榜状元”董德元作序。董德元与权相秦桧过从甚密,与同年进士朱熹颇有交游,官至左仆射。董德元在序文中提及刘铎的同年状元刘章为刘铎父母撰写墓志之事。

综上所述,亿田刘氏家族从十六世至十八世,前后进士登科 8 人,以姻亲、同年、师生、同僚等关系,进入到以欧阳修、刘恕、曾巩、曾布、董德元、刘章等人为引领的士人群体之中,形成盘根错节的人际网络,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元明时期。明初吉水大儒解缙为亿田刘氏第二十六世刘仲海作墓表,还提到其为刘良肱之十一世孙,刘良肱后裔与同年解希孟、董偁兄弟、杨淳师等家族的后人世代保持联系,“今三百年来子孙犹相往还也”③。可知刘良肱及刘氏家族直到明初仍在当地士林家声不坠。

三、亿田刘氏举业成功折射的唐宋之际科举社会成立的乡村土壤

关于宋代科举与地方社会的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点是社会阶层的流动,尤其集中于那些见诸史传的出身下层平民家庭的著名文士和官员④。此类研究所取材的史料除了官修史传之外,多为名人文集,间有采用方志资料者,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直观认识的少之又少。本文通过田野查发现,唐末十国时期因官留居在偏僻乡村的吉水亿田刘氏家族,在宋代取得了显著的举业成就。凭着家族内第一位进士及第者刘良肱长嫂彭氏的墓志和传承有序的族谱记载和地方志相互对照,这个原本寂寂无名的家族及其举业成功的历史得以浮出水面,昭示着唐宋之际科举制度与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而这个现象的背后,则隐藏着宋代科举社会如何根植于乡村土壤的历史密码。

科举取士在唐宋之际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应举和及第者的阶层下移,乡村平民及第者占比迅速扩大;二是应举和及第者的地域南移,尤其是此前属于十国中的南唐(包括被南唐并灭的闽)和前后蜀政权范围内的各州士人占比相当高。发生这种变化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趋势,学界有着充分且不乏深刻的论述,然而主要是在国家政策和制度层面的探讨。这种变

---

① 王瑞来:《近世科举、士人与社会科举家族与地域网络——以曾安强与周必大为中心的个案解析》,《社会科学研究》2015 年第 3 期。

② 与刘景显同年及第者有泰和人曾安中、安福人刘弇。钓源出土《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即由刘弇撰,见高立人、刘晓东主编《庐陵古碑录》,第 43 页。

③ 解缙:《户部侍郎刘君墓表》,《解学士文集》(明嘉靖四十一年刻本)卷八,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 1 辑第 27 册,合肥:黄山书社 2013 年版,第 676 页。

④ 参见何忠礼《贫富无定势: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学术月刊》2012 年第 1 期,第 136—143 页。

化的历史轨迹要落到实处,则还需要深入发掘基层社会的官私教育和科举史料,尤其是改变科举历史的南方地区的方志和家族史料。

结合学界的已有研究,可以总结出宋代科举社会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士庶之别的含义不再是魏晋以来直至唐前期那种士族和庶族的分梳,而是士大夫与庶民的区别。由于科举的导入,这种区分实际呈现出流动状态,士庶不再是一种身份制意义上的阶层,转而成为一种职业制上的划分。尤为重要的是,“不只是在科举中合格,被承认具有应试资格与能力等与科举相关之事也成为进入士人阶层的条件,士大夫和庶民之间出现了大量被称之为士人的中间层”。① 这是近藤一成所说的“社会流动性”。二是社会结构变革的动力和契机来自于科举造就的社会流动,包括区域经济文化地位的隆替及社会阶层的升降,都是在科举带来的社会流动中重新洗牌。针对“社会再生产机能”,近藤一成强调科举不仅产生官员和候补官员,还产生更大量的落第者,并建立起落第者也信服的社会分层机制,科举制因之支撑起整个社会体制的再生产系统②。三是社会“人际网络”的建构机制主要是通过科举,科举不仅是构成重大政治事件的关键要素,而且成为支撑政治生活中日常与基层的重要元素③。四是崇文重教社会风气的形成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尤其是读书改变命运的价值追求深入到基层乡村社会,影响及于乡村女性。如包伟民指出,即使那些乡村贫下户也竭力支持甚至强迫子弟入学就读,且以应举为目标。同时,每年大量的落第举子又为乡村社会提供了充足的师资力量,进一步构建起不同层次的教育体系④。在这种背景下,无论地域和阶层,科举带来的价值体系不断深入人心,影响整体社会面貌。与此同时,阶层重组推动的社会结构变革,使得原本出自基层的知识精英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寄托和价值认同。乡村举子们最初奋力于科场进而跻身士流的目的是为了干禄养亲,随着其政治地位和文化影响力的上升,他们从乡村和基层走来的人生阅历便结合进新的知识创造之中,融入一个更为广大的知识精英群体,他们的视野和境界必然逐渐扩大和升华,进而造就了宋代士大夫普遍具有的心怀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改造社会的现实精神。

亿田刘氏是唐末五代动荡环境下因官留居吉州的中下级官员在当地乡村发展成为中小地主的代表。这些从社会中下层平民家族中走出的科举及第者,乘着士人地位在五代时期的短暂下降及宋初的迅速提升,以及宋代科举录取人数增加的时风,跻身于知识精英阶层,并集中呈现出中国历史的新走向。包括吉州在内的江西地区,北宋建立前原本在杨吴和南唐统治下,在唐代虽有经济发展的起步,文化精英却鲜有出自这一地区者。由于唐末五代的时事巨变,北方传统的文化中心地区遭到严重的破坏,世家大族在风起云涌的政治动荡中被消灭殆尽,宋代统治者有意识地启用寒俊,社会阶层的流动呈现出空前的活跃态势。一些因官留居并迅速在乡村获得发展的地主富户,在地方政权尊儒重教政策的支持下,以新的起点进入到转换了轨道的中国历史进程之中,成为宋代新型政治文化引领力量发展壮大的乡村基础。如贾志扬指出的,包括吉州在内的赣江流域富饶地区的科举成绩,第一个增长期出现在北宋的最初一百年⑤。欧阳修就是这个一百年里吉州士人的杰出代表,只有深入了解像刘良肱这样的当地平民士子如何走出乡村走向士林,才能对欧阳修的地域身份及其产生的全局性影响作出符合历史大势的评价。此外,还应注意到,宋初的科举制度除了吸纳统治人才之外,尚有一个重要的契合时代需要的目的,就是防范游民武装⑥。原本

① 近藤一成:《宋代中国科挙社会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 2009 年版,第 4 页。

② 参见近藤一成《宋代科举社会的形成——以明州庆元府为例》,《厦门大学学报》2005 年第 6 期,第 15—24 页。

③ 参见平田茂树《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以科举社会的“人际网络”为线索》。

④ 包伟民:《中国九到十三世纪社会识字率提高的几个问题》,《杭州大学学报》1992 年第 4 期,第 79—87 页。

⑤ 贾志扬:《宋代科举》,第 215—216 页。

⑥ 吴铮强:《宋代科举与乡村社会》第四章,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年。又参见吴铮强《科举理学化: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0—34 页。

属于敌国的南唐旧境之乡村富户,也许是北宋政权需要极力防范和吸纳的对象。亿田刘氏举业的成功,以及宋初吉州地区大量乡村士子科举及第,或者有着这样一个深层的政治背景。

亿田刘氏是能够反映出宋代科举社会乡村形态的平民家族,其在北宋举业成功的历程,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上述宋代科举社会的基本特征,并生动而具体地补充了我们对这些特征的认识。论者可以举出两宋时期大量的出自平民家族的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包括以王禹偁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低级官员子弟和以冯京为代表的商人子弟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宋代科举社会形成过程中出现的精英人物背后,还有着刘良肱及其兄弟子侄那样的浮沉于科举门槛内外的乡村士子。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庞大的介于士大夫和庶民之间的“士人”中间阶层的存在,以及这个中间阶层的动态存续,才使得所谓科举社会能够在宋代建立以后维系数百几近千年之久。也正因为这个中间阶层的存续方式是动态的极不稳定的,历史给予某个具体乡村家族通过科举实现阶层上升的通道并不总是畅通的,而有可能只有一个较为短暂的窗口期。北宋平民出身的科举精英,虽然也出现了少数世家大姓,如福建浦城章氏,数百年间以科举考试仕宦不绝,持续数代“尽有诸元”,居高者位及宰相①。但多数情况下,走出乡村的士子由于自身的局限和社会竞争的激烈,其对居于乡村原生家族的带动力非常有限,影响力也仅在两三代人之间。尽管家族记忆中还会长期留存曾经的精英事迹和祖上荣光,也不断有人重复前辈的努力,但实际成效和成功概率往往是递减的。第一代科举成功的下层平民学子,与其原生的耕读之家往往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在一定时期内甚至引领着桑梓故土一大片乡村学子的精神追求。而他们的后代一旦在政治文化中心立足,这种联系也就越来越弱。而错过了社会流动窗口期的乡村家族,如果没有充足的经济文化条件及合适的政治际遇,往往难以借助早已走出乡村的先辈之辉煌来复制其成功。这同样是亿田刘氏家族在北宋时期举业成功而后湮没无闻带给我们的历史启示。

The Rural For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ociety in the So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n the Succes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by the Liu's Family from Yitian Village of Jishui County

Ma Liqing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s a typical mountainous village with a population fewer than 100 in central Jiangxi Province which was culturally developed in the Song Dynasty, Yitian Village (亿田) in Jishui County (吉水) made a glorious history of success in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1049 which was the first year under the reign of Emperor Huangyou (皇祐)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one of the villagers named Liu Lianggong (刘良肱) pass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n quite a few people within three generations of his family also achieved succes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To incorporate the success made by the Liu's Family of Yitian Village into Chinese history concerning the in-depth social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he Tang and the Song Dynasties, will reveal its specific social condition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help to understand the rural environment wher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ociety was formed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interpret the rural form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ociety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from the regional and grassroots perspectives.

Key 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 society, rural form, Song Dynasty, local culture of Luling Prefecture (庐陵文化)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王善军:《“尽有诸元”:科举与宋代浦城章氏家族的发展》,《中国史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129—150 页。